

朝向“新生活”的思想革命 ——以《新青年》中的陈独秀、周氏兄弟为中心

李雅娟

论文摘要：《新青年》杂志不止是一个发表个人思想言论的信息载体，也是一个读者共时阅读的空间场域，这使它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自身也具有组织意义生产的思想功能。《新青年》作者群也是其读者群，通过写作与阅读的双重行为，具有个体差异的思想观点通过《新青年》这一空间场域，合力生成一种既包容差异又超越差异的普遍性立场。本文以陈独秀、周氏兄弟为例，通过将其言论还原到《新青年》杂志阅读的历史空间场域，讨论这一思想合力如何发生、生成何种意义。这一聚合了立场、观点以及个人交谊的空间经验，也成为不可磨灭的思想记忆，对《新青年》阵营分化之后的个人持续产生影响。

关键词：《新青年》思想革命“新生活”

《新青年》杂志不止是一个发表个人思想言论的信息载体，也是一个读者共时阅读的空间场域，这使它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自身也具有组织意义生产的思想功能。尤其在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北迁，北大文科同仁加入作者队伍、轮流编辑之后，更多互异的思想立场、文学观点由各人发表，而在《新青年》这一空间阅读场域中交织、对话、互补，产生1+1>2的思想合力。本文选取陈独秀、周氏兄弟作为讨论这一思想合力的主要对象，理由在于：其一，如果不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那么在思想标签上对立的二人，如通常被视为共产

主义知识分子的陈独秀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其思想的关联容易被忽视,如既有研究基本只关注到陈周二人的私人交谊^[1]。其二,下表为除《通信》栏中的讨论文字之外,将《新青年》的主体刊载大略分为论文、创作、翻译、随感录四类,粗略统计的各人发表数量。如果以《新青年》中的发表数量作为衡量作者影响力、决定杂志主体风貌的一个标准,那么陈独秀之外,周作人几乎可与胡适比肩。如果忽略《新青年》时期周氏兄弟之间的微小差异而将他们视作一个单位(本来文章也有互相署名^[2]),那么第四卷始加入的周氏兄弟几与陈独秀持平。

作者	论文	创作	翻译	随感录	总计
陈独秀	55 篇	新诗 2 首	5 篇	57 篇	119 篇(首) 共 47 期
胡适	21 篇	白话诗词 45 首 话剧 1 篇	7 篇(首)	0	74 篇(首) 共 35 期
周作人	12 篇	新诗 13 首(组诗 按照一首计算)	32 篇(组诗按照 一篇计算)	5 篇	62 篇(首) 共 28 期
鲁迅	2 篇	新诗 6 首 小说 5 篇	4 篇	27 篇	44 篇(首) 共 21 期

一、从“伦理革命”到“思想革命”

《青年杂志》第一卷在上海由陈独秀编辑出版时,携带着从《甲寅》月刊延续下来的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由于读者对象被明确定位为“青年”群体,关注政治的方式、内容、文体风格也相应发生变化^[3]。从(作者/政治精英)直接评论现实政治转向启迪(读者/青年学生)思想文化修养,“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本意并非割裂“改造思想”与“批评时政”,而是因为他首先要面对“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的政治被动性、冷淡感,政治知识与政治能力的匮乏,“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从而将思想改造作为前提来思考。

因此,思想改造的目标与政治参与相关。陈独秀呼吁国人在西洋文明输入促进学术的觉悟之后,实现作为“最后之觉悟”的“政治的觉悟”:不仅“必弃数

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且只有自居为政治主体才能实现立宪政治，“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5]。也就是说，思想改造的目标在于造成具有民主政治意识与行为能力的政治主体，即陈独秀参照德俄革命提出的兼具思想学识与政治实践的“新青年”，“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6]但与德俄革命指向专制政体、诉求制定宪法不同，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处于“共和告成”、立宪政治实施的时代。因此，政治主体的造成不是经由政治实践，而是从批判中国特有的、作为专制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纲常伦理入手，“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伦理的觉悟”成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伦理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

《青年杂志》第一卷发行的1915年9月至1916年2月，正值袁世凯称帝的酝酿时期，“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显然有受到现实舆论环境钳制的不得已苦衷，因此第一卷凸显传播思想文化学说的侧面。第二卷改名《新青年》于1916年9月出版时，帝制已取消，复辟思想言论依然甚嚣尘上，陈独秀就开始立足伦理批判不遗余力地“批评时政”，如2卷2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2卷3号《宪法与孔教》、2卷4号《袁世凯复活》、2卷5号《再论孔教》等文，集中火力批驳儒家三纲伦理与现代政治、现代生活之绝不相容。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新青年》编辑部已迁至北京后的第三卷，随着欧战局势发展，伦理批判的焦点从国内政治延续至国际政治。如3卷1号《对德外交》、3卷2号《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3卷4号《时局杂感》等文，在国家政治的民主主义与君主主义之争之外，增加国际政治的人道主义与侵略主义之争的批评维度，“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吾国前日之讨袁”，“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8]。直至第八卷开始积极“谈政治”、宣传马克思

主义，其间并非无连锁贯通之理。

作为政治革命先导的角色定位，规定了“伦理革命”的内容。陈独秀通过将儒家伦理条目分割为封建时代的特殊伦理与人类普遍道德两部分，将批判矛头指向儒教特有的政治伦理，“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完全有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9]儒家特殊伦理既为伦理革命所破之“旧”，而“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10]，那么伦理革命所立之“新”，也并不包含人类普遍道德的部分，而是指向儒家政治伦理所匮乏的政治人格的独立自主、人权的自由平等。但这样也就将“伦理革命”封闭在政治革命内部，正如附属的奴隶道德与古代“贤人政治”相缘为因，自主的主人道德也只能产生自现代民主政治，“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11]。

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特殊性在于伦理政治一体化，家国天下与人伦日用，统归于儒家，三纲五常既规定了国家公共事务领域的政治伦理，也规定了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伦理。因此，即便由于陈独秀个人的政治热情，伦理革命被封闭于政治领域，但它的提出本身就埋伏着向社会生活领域突破的可能。伦理革命不仅有望造成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政治主体，也可能塑造社会生活领域的现代伦理主体。陈独秀的确也从“道与世更”的朴素唯物论角度，提出儒家阶级纲常伦理与现代生活的不相容，“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伦理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12]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生活应以个人主义为伦理原则，以独立个人为伦理主体。不过，由于后发现代国

家的性质，中国的经济生活，近代以来即饱尝现代自由竞争经济所带来的殖民主义之苦，既产生反抗专制强权压迫的政治诉求，也生发反抗现代性话语压迫的思想诉求。陈独秀认为中国“产业未兴”，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尚未出现，“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13]的社会主义暂时无从谈起^[14]，那么为了抵抗殖民主义、侵略主义，互助论与人道主义必然进入道德伦理视野，“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达氏虽承认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亦承视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也。”^[15]因此，陈独秀对个人主义的接受，是在科学原理的意义上，确信个人主义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16]，而在实践中绝对坚持的只是政治个人主义。此一坚持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17]。个人主义既没有贯彻为现代生活整体的伦理原则，政治个人主义与社会人道主义伦理之间缺乏有效连接，那么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伦理革新仍被回收到政治领域，“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18]，而古老的“贤人政治”就可能换上“模范”的新名词卷土重来，“吾民之德蔽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19]

因此，如何在政治个人主义与社会人道主义之间建立联结，生成兼具政治性与伦理性的中国现代主体，就成为《新青年》思想改造的关键命题。以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为契机，陈独秀开始从国民性角度思考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生若何效果也”，伦理革命由此进展到以改造国民性为改造社会途径的思想革命。作为国民性表现的文学的革新，与思想革命合一，成为政治革新的前提，“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0]

思想革命改造国民性的面向，产生了独异个人对庸众社会宣战的启蒙主义叙事，“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21]改造社会的目标体现为伦理革命的道德主义叙事，“废弃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22]因此，个人独立与人群互助成为《新青年》思想革命潜在的张力结构，个人总有一种向群体归依的趋势，“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23]这种将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辩证联属的人生原理，在不同思想立场的《新青年》作者那里得到相一致的阐述，胡适认为代表了整个《新青年》的人生观，“这一篇和本志四卷二号陈独秀先生的《人活（生）真义》，陶孟和先生的《新青年之新道德》，四卷四号李守常先生的《今》，大旨都相同。这四篇差不多可算是代表《新青年》的人生观的文字。”^[24]正如“人类永久生命”只是无数个体的人生死流转的连续，思想革命的社会改造，也指向独立个体之间的互助联合。这种联合形态，将人从一切既有的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又不封闭于原子式个体，而是形成伦理性的人类共同体，创造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人际关系，本文称之为“新生活”。负载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也在个人主义与人类主义之间内含着一种思想张力。

二、“文学革命”的展开：从“写实派”到“理想的写实派”

“小我”与“大我”、人生与宇宙的融汇合一，对陈独秀来说，不是“天人合一”式的宗教玄学，而是诉之于科学理性可以实证的科学人生观，“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真能决疑，厥为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25]科学理性不仅作为思想方法，具有揭示宇宙人生真相的思想作用；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人生信仰，具有道德意义^[26]。

据此，陈独秀推崇由于科学大兴在西方文学演进上继理想主义而起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尤其以左拉为魁首的自然主义。陈独秀接受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想，“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27]，但并不以此等同于“文学”本身。他的文学本体论，结合了胡适“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学观与传统文章学“文”的修辞性意象，“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28]同时，“文学之文”的美学形态，也响应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摒除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规范^[29]，而置换以情感主体的形式创造，“文学美文之为美也，却不在骈体与用典也。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30]文学情本体的确立，使中国“文以载道”传统中以说理为主的散文，被排除于“文学之文”，而西方文学从写作方法上区分的“再现”与“表现”得到文学主体与修辞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安德烈耶夫、梅特林克等被文学史分属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才被共同置于“自然派”代表作家的行列。“文学革命”三大主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1]，以文学主体（国民）、艺术方法（写实）与读者对象（社会）三位一体，既表明文学革命的主体创生与艺术形式创造的密不可分，也表明主体创生以启蒙大众为归宿，也就是说，国民文学即写实的文学，也即社会的文学。

因此，自然主义如实描写的“写实”，不仅作为艺术方法，而且生成一个道德情感诚实的文学主体，以及启蒙大众的道德诚实，改造“‘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32]。这使文学启蒙对客观现实的依赖度很高，依赖作品客观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发挥启蒙作用，文体首选剧本，忽略散文，“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最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33]

《新青年》早期刊载的翻译文学（诗歌因文体特殊，暂不讨论^[34]），忠实地体现了陈独秀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想。下列表一统计了周氏兄弟之外的其他译者发表译作（小说和剧本）的情况。可以看到，译作以19世纪英法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品为主，戏剧居半，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屠格涅夫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家。按照陈独秀的划分，与“理想派”文学相区别，可统称为“写实派”文学。以翻译文体而论，2卷1号胡适译《决斗》是《新青年》第一篇白话翻译作品。不过，由于戏剧文体的特殊性，1卷2号开始连载的王尔德剧本《意中人》，人物台词已经使用白话，只是舞台提示尚用文言。“译者识”也用文言。这种文体区别，实际上起到将剧中人物、作者、译者各自的声音与观点区分出来的作用。其形式意味在于，译者的主体性在与作品主体性的并置中，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读者接受的不仅是作品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有译者的思想意图。这种“译者识”类似于“剧场”的作用，将作品的现实意义直接展示，虽然有时只是译者附加的主观“现实”。例如胡适《二渔夫》的译后记，分析作品作为“自然派”文学在取材、写法、命意等方面的特点，借题发挥自己区分“自然的爱国心”与“狭义的国家思想”、抑此扬彼的思想主张，以及对德英美国家主义的现实批判^[35]。《决斗》虽为白话译文，而“译者识”同样采用文言，也起到同样的作用。这种翻译文体甚至也许影响到创作，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的第一篇作品4卷5号的《狂人日记》，其著名的文言小序加白话正文的文体形式，正有相似之处。而其作用，也是使作品中的声音由于区分而变得复杂化、多声部化，从而产生无尽的文本意蕴。直到曾参与《新青年》后期编辑工作的茅盾40年代创作日记体小说《腐蚀》，仍采用偏于文言的小序加白话正文这一文体组合形式，同样使得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强化了写实主义小说的思想倾向，只是相较《狂人日记》稍显生硬和外在。这一文体创新，或许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用“太史公曰”将作者评论与客观叙述相区分而又置于同一个文本内的史传文体，也昭示着新文学的创生与其从理论上反对的“旧文学”割不断的血缘联系。

表一 其他译者的翻译小说/剧本

作者	国别	生卒年代	篇名	卷期号	译者
屠格涅夫	俄国	1818-1883	《春潮》	1卷1号至4号连载	陈赅
			《初恋》	1卷5号至2卷2号连载	
泰来夏甫	俄国	1867-1957	《决斗》	2卷1号	胡适
库普林	俄国	1870-1938	《快乐》	9卷1号	沈泽民
王尔德	英国	1854-1900	《意中人》(剧本)	1卷2号至4号、6号, 2卷1号、2号连载	薛琪琰
			《弗罗连斯》(剧本)	2卷1号、3号连载	陈赅
			《遗扇记》(剧本)	5卷6号, 6卷1号、3号连载	沈性仁
			《天明》(剧本)	4卷2号	刘半农
麦道克	英国		《磁狗》	2卷5号	刘半农
梅理尔	英国		《琴魂》(剧本)	3卷4号	刘半农
路梅托	法国	1853-1914	《寺钟》	2卷4号	汪中明
龚古尔兄弟	法国	1822-1896	《基尔米里》	2卷6号、3卷5号连载	陈赅
		1830-1870			
莫泊桑	法国	1850-1893	《二渔夫》	3卷1号	胡适
			《梅吕哀》	3卷2号	
			《白蒲田太太》	6卷3号	张黄
			《西门底爸爸》	9卷1号	沈雁冰
易卜生	挪威	1828-1906	《娜拉》(剧本)	4卷6号	罗家伦·胡适
			《国民之敌》(剧本)	4卷6号至5卷4号连载	陶履恭
			《小爱友夫》(剧本)	4卷6号、5卷3号连载	吴弱男
卞尔生	挪威	1832-1910	《新闻记者》(剧本)	7卷5号、8卷1号、9卷2号连载	沈性仁
包以尔	挪威	1872-	《一队骑马的人》	9卷4号	沈雁冰
葛雷古夫人	爱尔兰	1852-1932	《海青赫佛》(剧本)	9卷5号	沈雁冰

第四卷起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尤以周作人发表翻译作品为多。周氏兄弟一面带着清末翻译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情感记忆，一面在陈独秀奠定的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再度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下列表二统计了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发表译作的情况。

表二 周氏兄弟的翻译小说/剧本（斜体部分为鲁迅所译）

作者	国别	生卒年代	篇名	卷期号
梭罗古勃	俄国	1863-1927	《童子 Lin 之奇迹》	4卷3号
			《铁圈》	6卷1号
库普林	俄国	1870-1938	《皇帝之公园》	4卷4号
			《晚间的来客》	7卷5号
托尔斯泰	俄国	1828-1920	《空大鼓》	5卷5号
契诃夫	俄国	1860-1904	《可爱的人》	6卷2号
安德烈耶夫	俄国	1871-1919	《齿痛》	7卷1号
但兼珂	俄国	1849-	《摩诃末的家族》	7卷2号
科罗连珂	俄国	1853-1921	《玛加尔的梦》	8卷2号
<i>阿尔志跋绥夫</i>	<i>俄国</i>	<i>1878-1927</i>	<i>《幸福》</i>	<i>8卷4号</i>
<i>埃罗先珂</i>	<i>俄国</i>	<i>1890-1952</i>	<i>《狭的笼》</i>	<i>9卷4号</i>
斯特林堡	瑞典	1849-1912	《不自然淘汰》	5卷2号
			《改革》	
藹夫达利阿谛斯	希腊	现代作家 (据译者识)	《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	5卷3号
			《扬尼斯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	
显克微支	波兰	1846-1916	《酋长》	5卷4号
			《愿你有福了》	8卷6号
什朗斯奇	波兰	1884-1925	《诱惑》	7卷3号
			《黄昏》	
普路斯	波兰	1847-1912	《世界的霉》	8卷6号
江马修	日本	1889-1975	《小小的一个人》	5卷6号
千家元磨	日本	1887-1948	《深夜的喇叭》	8卷4号
国木田独步	日本	1871-1908	《少年的悲哀》	8卷5号

武者小路实笃	日本	1885-1976	《一个青年的梦》(剧本)	7卷2至5号连载
菊池宽	日本	1889-1948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9卷3号
安徒生	丹麦	1805-1875	《卖火柴的女儿》	6卷1号
O. Schreiner	南非	1855-1920	《沙漠间的三个梦》	6卷6号
宾斯奇	犹太	1872-1959	《被幸福忘却的人们》(剧本)	8卷3号
阿伽洛年	阿美尼亚	现代作家	《一滴的牛乳》	8卷6号
伊巴涅支	西班牙	1867-1928	《癫狗病》	9卷5号

对比表一,可以看出差异很明显。以国别论,俄国、日本、波兰作家居多,兼及甚至并不常见的南非、犹太、阿美尼亚作家,英法等大国文学反而不见踪影,与清末翻译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选择有同一考量^[36]。译作以小说为主,剧本只有两部。此外,时代意识很鲜明。如果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以一战结束的1918年为节点,1918年之后仍然健在的作家(个别生卒年代暂无法确认的作家也包括在内),表一中约有6位,占总数的46%;表二中约有18位,占总数的75%。这意味着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中,受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洗礼的作家占绝大多数。与“写实派”文学相较,可谓经过写实主义洗礼的“理想的写实派”,如科罗连珂“是写实主义后的理想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品”^[37],显克微支“我们从这一篇可以看见他在理想的写实派以外,又是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38],伊巴涅支“他的著作于自然派的气息以外很有理想派的倾向了”^[39]。

“写实派”的艺术方法是“写实”,生成的是偏于共性的道德主体。“理想的写实派”的艺术方法不拘一格,写实、印象、寓言、比喻、民间故事、幻想、神秘、象征、抒情,译作无所不备,“我们所要求的文学,在能解释人生,一切流别,统是枝叶”^[40],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文体界限也趋于模糊。不限于“写实”,也就不为客观现实所限,重在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表现主观内部真实;而不缺失“写实”,就使主观真实扎根于现实人生,旨在对人生提出各具个性的多样解释,

以情感的真挚取胜，“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41]从而生成富于个性的情感主体。甚至“写实”也成为一种抒情，周作人即从这一角度理解自然主义文学，“自然派作家虽然主张无解决无感动的态度，但他自己总有一种人生观，隐隐跃跃在书中露出”^[42]，“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 Zola 说，也仍是‘通过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43]。这一翻译倾向，与表一中于《新青年》后期登场、后来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的翻译更为接近。沈泽民翻译的俄国作家库普林，是两表中唯一重合的作家，其译文文体标明“神话”；而周作人翻译的犹太作家宾斯奇，沈雁冰曾在后来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大力推介^[44]，“我以为‘精神总是现代的’这一层，实是宾斯奇著作为不论何种人都喜欢而看了生感动的主要原因”^[45]。

艺术方法与文学主体的变化，也带来文学作用于现实的启蒙方式的改变。“写实派”文学依赖文体的“客观现实性”，如戏剧在剧场直接感触观众、小说直接“模仿”现实，或者依赖外在附加的思想倾向。文学过重依赖客观现实条件，则可能使“文学革命”的步伐因迁就现状而从“写实”的立场后退，“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掙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46]“理想的写实派”文学，张扬主体意识反抗物质现实，甚至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者”，“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47]不仅使人的主体意志超拔于客观现实之上，并且将文学的社会功能收归到文学主体与读者对象之间除了文字本身不依赖任何现实物质条件的情感传递，“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48]。通过由现实所孕育的主观情感性与艺术创造性的结合，发挥启蒙作用。高扬文学的主体性、情感性，这就提供了以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思想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改造的可能。青年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举反抗 19 世纪物质文明、强调个人与主观的 19 世纪末新神思宗，视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49]。

三、“人道主义文学”与“美的劳动”

随着1917年8月对德宣战，中国涉入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利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思想革命的目标随之扩大到反帝反侵略。对个人的奴役和压迫，不仅来自专制制度，也来自私有制经济制度。私有制经济制度将个体的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因此，思想革命从“人的解放”进一步，到达反抗资本主义劳动压迫的“劳动者的解放”。“新生活”的独立个体的互助联合，进展为“劳动者主体的互助联合”，人类共同体以劳动者共同体为具象。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压迫首先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形式出现，则“劳动者的解放”以反战为前提。反战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包括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是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二者在《新青年》中统一。

对一战胜利立刻给以响应的李大钊，于5卷5号^[50]发表《庶民的胜利》《BOISHEVISM的胜利》，为《新青年》传播“社会主义”之始，对于“社会主义”与劳工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做同义解。周作人翻译英人Angelo S. Rapport所作《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连载于6卷4-5号，该文作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主义尚未取得胜利。在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俄国历史上诸种革命思想进行述评之后，作者将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政治混乱状况，归因于各派思想上的各执己见，对俄国人的“理想主义”颇有微词，“他们又时常将伦理学上的‘应该’，当作日常的‘实是’，将梦想当作事实。俄国人是生就的理论家，专讲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执着他们自己的理论。”周作人译后记对此表示不以为然，“至于著者的批评，译者却颇有不能同意的处所：譬如论中太重现实而轻理想，到后来理想成了事实，那批评便也难以存立。”作为理想成为“事实”的例子，周作人举出德国革命。但当然，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想”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时也已成“事实”，隐而不彰或许碍于北洋政府对“过激主义”的防范。6卷4号同期刊出从《每周评论》转载的《思想革命》一文，其中“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作‘黑

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置于这篇译文的语境，就变得饶有趣味。“德文或世界语”决不是随意举出仅用以论证比文字改革更紧要的思想改革的重要性，而且隐喻了“社会主义”或“世界主义”理想，并将二者并列置于中国首要的改革“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的思想革命语境中，如果不首先清除这些“荒谬思想”，那么任何“理想”都可能变质、腐败。6卷5号由李大钊编辑，堪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周作人的译文与一篇《巴枯宁传略》侧身于有7篇相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研究的11篇论文中，“社会主义”来源不止一端可见一斑。

与高度关注“革命的俄国”同时，“文学的俄国”在文学革命的延长线上出现。周作人第一篇载于《新青年》的文章，即4卷1号评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高度称扬其擅长写出“下等堕落人的灵魂”内蕴的“美与光明”，情感深厚博大，引起缺少英雄情结同时又期待人性向上的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不过，周作人包括同样对陀氏给出高度评价的鲁迅，从未翻译过陀氏作品。陀氏被称为“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显示灵魂的深者”^[51]，从深刻表现内在心理真实而言，固不属于“写实派”，但也很难被引为“理想的写实派”的同调。因为在解决人生问题方面，周作人对于梭罗古勃提出真实世界以外的“空想幻觉”尚且保留，“但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算是唯一的办法”^[52]，更不用说陀氏放弃“奋斗”皈依宗教的思想倾向。因此，周作人用以统一“理想的写实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思想”^[53]，与从宗教博爱生发单讲利他的“人道主义”，含义不同。在情感主体反抗现实的意义上，周作人为人道主义赋予了革命性，“人道主义文学”由此汇入反抗旧世界不平等秩序的“社会主义”潮流之中，成为社会改造的手段。8卷5号发表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已是陈独秀从8卷1号开始提倡社会革命之后，回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其民族精神特色，目为“俄

国近代的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派的文学”。从“写实”而言，俄国近代文学反映了俄国 19 世纪社会情状，“他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这使周作人获得扎根于本民族社会现实创造新文学的启示，与《新青年》早期单纯强调学习西欧思想已经不同，“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同时，受到浪漫主义文学观影响，周作人将文学视为民族精神的表现^[54]，又使中俄新文学同中有异，“但因了这特别国情而发生的国民的精神，很有点不同，所以这其间便要有许多差异。”最后，“人道主义文学”观将国民精神连接上反抗性、革命性，使“为人生”的新文学不仅“诗言志”，并进而具有创造“新生活”的力量。有一个切实的“将来”可以期待，即便面对由于历史重负已经变得陈腐、衰败、停滞的“老大中国”，也唤起了周作人趋近“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豪情，“但我们总还是老民族里的少年，我们还可以用个人的生力结聚起来反抗民族的气运。……我们如果能够容纳新思想，来表现及解释特别国情，也可望新文学的发生，还可由艺术界而影响于实生活。……社会的背景反映在文学里面，因这文学的影响又同时的使这背景逐渐变化过去，这是我们所以尊重文学的缘故。”同期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表达了在这一信念之下文学者组成近似“劳工联合”的“著作同业联合”，号召“为人生”的文学，“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此事为他终身底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不过，即使有着同一方向与目标，反战思想与反战的实现不同，正如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5 卷 6 号刊载周作人翻译的“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江马修的小说《小小的一个人》，诠释了“人道主义文学”创造理想的“新生活”的可能及限度。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便利，是可以将“彼此都是人类”的“人道主义”作为“我”的思想，不证自明地直接表达出来，“如此想起来，就是我们眼前走路的那个全不相识的孩子，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实有复杂的缘，像网一样，同他系住。”具有这种“人类”意识的“我”，据此一面控诉战争破坏人类生命的连带关系所造成的人类痛苦，一面通过“我”与“全不相识”的鹤儿姑娘之间的

相识、交往，表现作为“人类的一个”的个体之间可能产生的互相联结、相怜相爱的伦理图景，“人类中有那个孩子在内，因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爱人类。”小说中通过“我”的话语表述的“反战”思想，既是现实中战争的反映，也是通过战争的残虐生命从反面佐证“彼此都是人类”的连带关系。这暴露了叙事上的一种“颠倒”，“人道主义”须以反战的实现为前提，而非相反，思想自身并不具备反战的实力。直到若干年后，当实地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自南向北全面推进时，五四启蒙主义叙事的这种“颠倒”被鲁迅纠正过来，“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55]。

而五四其时，正被“理想”激动着的周作人，在其“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欣然接受了日本新村运动提供的“新生活”图景，“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56]新村运动在五四时期受到从事社会改造者的热心关注，同时从社会改造的角度也被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如胡适认为，新村跳出现社会另行组建理想的社会组织，并不能改造社会，只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新生活”^[57]。周作人对新村的辩护，一则认为新村是从改造个人做起改造社会，改造个人即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二则从维护“理想”的角度，认为新村的理想树立了道德改革的模范，尤其在他实地参观了日向新村，体验了半日新村的劳动生活，身体的困倦抵不过“三十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的精神愉快时^[58]，对这“理想”的圆满和实现就更加确信不疑，“这种浑融的感情，在实验确是可能，于道德改革上很有效力，是新村运动的一种特色与实效。”也就是说，并不是作为物质实践的“劳动”本身，而是从“劳动”产生的精神愉快，劳动对于“‘智识阶级’的精神的不安”所发生的安定作用^[59]，“良心的平安”^[60]，才是周作人的关注点。因此，新村运动的改造个人更像是知识分子借助“劳动”的自我改造，而且首先成功地改造了周作人。“劳动”获得知识分子的尊重，而知识分子以超越“劳动”的“理想”为它赋予意义，“我的意见

生活与劳动是两件事。劳动本身原没有什么神圣，因为他的结果能够于生活有利所以可贵^[61]，也就是获得对它的叙事权力，本质上仍不脱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叙事。“劳动”与“生活”分离的结果，是“生活”即“正当的人的生活”从“劳动”那里带走了劳动主体，“劳动者”被从“劳动”剥离，变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主体匮乏状态。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找“劳动者”，使自身获得完整，于是他“看到”了作为自身“理想”投射、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平民”，“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以及艺术美化的“劳农”，被赞美日本农夫“劳作的美”与性情“可爱”的文章引发共鸣，“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从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平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的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62]

借助这种“美的劳动”视野，周作人超越智识者与劳动者的阶级区隔，完成了自我意识更新，“对于上列二项的理想，完全了解，那便已得了新村的精神，虽然还不能去躬耕，在道德上已不愧为正当的新人了”^[63]。比起阶级斗争，他以如此更新的“美的劳动者”主体意识展开了对有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则在阶级对立之外，使平民阶级内部的复杂性凸显出来，如批评日本平民中“武士道的崇拜者”，“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与上等社会的“侵略家”思想同一^[64]，表明思想革命在社会革命中继续、二者相辅相成的必要。

与周作人从改造个人做起相对照，陈独秀从改造社会组织入手，突出“劳动”本位。一开始他仍对民主政治抱有希望，主张“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以“最小范围的组织”作为将来“大组织”的基础。五四时期出现的工读互助团，差相仿佛，陈独秀也列名发起人，并为它的失败辩护^[65]。随着《新青年》迁往上海，陈独秀从“同业联合”走向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

生产阶级)的国家”^[66]。文化创造被作为少数人闲暇时的精神活动,完成与社会运动的分离,“最不幸的是一般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的直接工具,……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懂得文化是什么。”^[67]与文化运动分离后的陈独秀,最终于1921年7月创建政党,走向“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叙不可”^[68],似乎回响着古老“贤人政治”的回声。

大约同时,周作人在1921年的一场大病中思想急剧变动,“颓废派”文人及作品进入阅读、翻译视野^[69]。“人道主义文学”从社会改造的前线退守到“自己的园地”,后者通常被视为周作人个人主义文学观的隐喻。意象的选择本身富于有“耕读”传统的农耕文化色彩,“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一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70]“蔷薇地丁”作为个人主义文学的隐喻,与“劳动”相关联,这是新村运动失败后周作人从新村“泛劳动主义”得到改造的自我意识的外化,“我以为他们提倡的泛劳动主义,却不会因了不大成功或终于失败而失了生命”^[71],生成的是“劳农”化的文人主体。因此,脱落附加于文学的社会改造目标,“个人主义文学”回归思想改造领域,展开对有产阶级思想尤其是私有制度下的道德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文体的个人风格愈发显著。继承《新青年》思想革命的《〈语丝〉发刊辞》表明,“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72]当社会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周作人对未经思想批判的阶级本位的文学运动提出质疑,“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如以阶级本位来谈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与有产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语句口气略有差异,大约如白话的一篇书经,仍旧是鬼话连篇。”^[73]反有产阶级思想不一定从阶级意识出发,保留了自由思想的空间,个人主义文学“独立的艺术美”也就具有了思想批判的“无形的功利”。

注释

- [1] 如张菊香：《从携手到分裂——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的交往》，《党史纵横》1995年第1期；蒋兵魁：《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陈独秀和周氏兄弟》，《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4期、2019年第1期。有关二人思想，主要是1922年“非宗教大同盟”事件中二人的分歧受到关注，如郭若平：《陈独秀与周作人关于宗教的论争》，《百年潮》2007年第11期。此外，工藤贵正《〈新青年〉与大正生命主义思想——鲁迅〈狂人日记〉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成立以及其思想性意义》，涉及陈独秀思想与周氏兄弟具体作品之间的某些关联，《上海鲁迅研究》2017年第1期。
- [2] 《新青年》“随感录”周氏兄弟署名的问题，参见秋吉收：《『随感录三十八』は誰の文章か—ル・ボン学説への言及に注目して》，《周作人研究通信》2015年12月第4号。本文在统计“随感录”数量时暂未做区分，只以发表时的杂志署名为准。
- [3] 关于《甲寅》与《新青年》的渊源关系，参见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孟庆澍：《新文学缘何而来——从〈新青年〉与〈甲寅〉月刊的差异说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 [4] 《通信》，《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本文所引用《新青年》，为193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重印版。
- [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 [6] 《通信》，《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
- [7]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 [8]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
- [9]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
- [10] 《通信》，《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
- [11] 《通信》，《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
- [12]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2卷4号，1916年12月。
- [13]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 [14] 陈独秀在《通信》中回复读者提出宣传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 [15] 《通信》，《新青年》1卷2号，1915年10月。
- [16] 见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对梅契尼科夫思想的解读，《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
- [17] 参见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 [18]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2卷4号，1916年12月。
- [19]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
- [2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 [21] 《通信》，2卷4号，1916年12月。
- [22] 《通信》，3卷2号，1917年4月。
- [2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1卷2号，1915年10月。

- [24] 胡适：《不朽》，《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
- [25] 陈独秀：《再论孔教》，《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 [26] 废名《知堂先生》一文曾记及周作人的话“科学其实也很道德”，王凤编：《废名集》第3卷，第13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27]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1卷3号，1915年11月。
- [28] 《通信》，《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
- [29] 胡适批评陈独秀提倡写实主义却刊载古典主义律诗，提出救治“文胜质”之弊的文学革命“八事”，得到陈独秀有商榷的响应。参见《通信》，《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
- [30] 《通信》，《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
- [3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 [32] 《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
- [33]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1卷3号，1915年11月。
- [34] 否则无法理解“以新输入之欧化是为”的陈独秀，何以要翻译刊载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Gitanjali 乃歌颂梵天之作。”参见陈独秀译《赞歌》注释，《新青年》1卷2号，1915年10月。
- [35] 参见胡适：《〈二渔夫〉译后记》，《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
- [36] 《域外小说集》于1921年增订重印时，周作人《序》言，“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可见其问题意识的延续性。《域外小说集·序》，第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 [37] 周作人：《〈玛加尔的梦〉译后记》，《新青年》8卷2号，1920年10月。
- [38] 周作人：《〈愿你有福了〉译后记》，《新青年》8卷6号，1921年4月。
- [39] 周作人：《〈癫狗病〉译后记》，《新青年》9卷5号，1921年9月。
- [40] 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译后记》，《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
- [41] 周作人：《空大鼓·旧序》，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第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空大鼓》是《点滴》的增订本，《旧序》为《点滴》原序。《点滴》1920年出版，收录周作人1918-1919年所译短篇小说，除《玛加尔的梦》以单行本出版之外，《新青年》中的译作全部收入。
- [42]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
- [43] 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记》，《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 [44] 《小说月报》发表过四篇宾斯奇的作品翻译：《美尼》（1921年第8期）、《波兰——一九一九年》（1922年第9期）、《暴风雨里》（1924年第3期）、《一个饿人的故事》（1925年第2期）；两篇评论：千叶龟雄《犹太文学与宾斯奇》（1921年第7期）、沈雁冰·郑振铎《现代世界文学者传略·宾斯奇》（1924年第3期）。
- [45] 雁冰：《〈美尼〉附记》，《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8期。
- [46] 《通信》，《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
- [47] 周作人：《〈童子Lin之奇迹〉译后记》，《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
- [48] 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记》，《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 [49]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50] 5卷5号目录页标记为“一九一八·民国七年十月十五日发行”，与5卷4号目录页标记时间相同。

5卷5号的“十月”当为“十一月”之误。理由：其一，欧战以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为结束标志，5卷5号前面一半文章与庆祝欧战胜利有关。其二，5卷5号刊载周作人的译作《空大鼓》，周作人日记1918年11月6日记载“抄空大鼓跋语了”。《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83页，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

- [51] 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5页。
- [52] 周作人：《〈铁圈〉译后记》，《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
- [53] 周作人：《空大鼓·旧序》，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第252页。
- [54] 清末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有言，“英人珂尔捶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55]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42页。
- [56]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6卷3号，1919年3月。
- [57]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其余质疑的意见，可参看瞿秋白《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郭绍虞《新村运动的我见》，《国民日报·批评》第4号，1920年12月8日；玄庐《新村的我见》、黄绍谷《新村的讨论》，《民国日报·批评》第5号，1920年12月26日；等文。
- [58]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30日。
- [59]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
- [60]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30日。
- [61] 周作人：《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工学》1卷5号，1920年3月28日。
- [62] 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
- [63]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
- [64] 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
- [65] 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 [66]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
- [67] 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
- [68] 《通信》（陈独秀），《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
- [69] 参见伊藤德也：《生活的艺术和周作人：中国のデカダンス＝モダニティ》，勉诚出版社2012年版。
- [70]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副镌》1922年1月22日。
- [71] 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晨报》1920年1月24日。
- [72] 周作人：《发刊辞》，《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 [73] 周作人：《文学谈》，《语丝》第138期，1927年7月2日。